

21 世纪中日关系中大学的使命与作用 ——基于在宁日资企业调查的思考——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贺晓星

提要 南京的对日招商引资面临一个怎样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可以积极地思考一下历史事件是否能够转化为推动日资企业来宁投资的动力,作为历史上的一座受害深重的城市,我们如何来加深和促进中日双方对对方民族和文化的理解,如何把经济的交流建立在深层次的对方理解、尤其是文化理解的基础上。一个在历史上受害深重的城市,为客观地理解对方的民族和文化做出不断的努力,其意义或许会大于未曾遭受过这种历史之痛的城市,一旦这种意义也为对方所意识到,相互的理解就会更容易加深,真正的经济投资才有可能。而要学会理解,必须培养一种习惯于问“为什么”的理性思维能力。如果说普遍被认同的大学的使命在于研究、教学和社会服务,那么,除了研究者自己的对于“为什么”的不断追问外,除了培养在校大学生对于“为什么”的不断追问之学习习惯与学术态度外,大学还有义务和责任为社会服务,提高一般市民的理性思维能力。

21 世紀の中日関係における大学の使命と役割を考える

——南京駐在の日資企業の調査に基づいて——

概要 日資企業の南京勧誘は、歴史と現実の関係をいかに適切に処理するかという問題を、いつも、宿命的に直面する。歴史事件を、日資企業の南京勧誘の壁ではなく、推進力のひとつにする可能性が果たして存在するかについて、われわれは積極的に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かつて多大な被害を蒙った都市として、中日双方互いの民族理解、文化理解を如何にしていつそう深め、経済交流を理解の上に、とりわけ相手の文化に対する理解の上に展開させるかについて、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民族と文化についての客観的な理解に払う

努力が要求されるが、多大な被害を蒙った都市が示した努力は、相手にとってもとりわけ意義が大きい。努力の意義が一旦相手に認識されれば、互いの理解も容易に深まり、経済投資も本当の意味で豊かなものになる。ただし、理解を可能にするためには、“何故”を問う習慣、言い換えれば、物事を理性的に考える慣習を身に付けさせねばならない。大学の使命が研究、教育、社会奉仕にあるというのならば、学者自身の“何故”を問う研究態度以外、“何故”を問い、理を究める学生を養成する以外、まさに一般市民の“何故”を問う精神と能力の開発も、大学自身の使命と役割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一、问题意识和调查方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作为东部重要沿海省份的江苏省，在引进外商投资方面一直呈现出高增长的势头。江苏省的外商投资，主要来自于欧美、台港澳和东亚，其中日本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投资国。但日本这几年的对江苏投资，主要集中在苏州、无锡、昆山、太仓一带，而较少来省会城市南京。

南京是经济强省江苏的省会所在地，是一个应该走在全省经济发展最前列的城市，对日招商引资方面的滞后，本身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中日关系史上，南京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地方，是一个敏感的名词与概念。与其他城市和地区不同，南京的对日招商引资面临一个怎样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问题。作为历史事件的“南京大屠杀”对日资企业的来宁投资是否有很大的影响呢？我们应该怎样来认识历史事件的影响？我们是否能够跨越历史事件的影响在对日招商引资方面做得更好一些？在此其中，大学的使命与作用又是如何？这些是本文思考的一些焦点问题。

根据问题意识，我们首先设计了结构式问卷，原打算以南京市日资企业的日方投资者或经理人员、管理人员为对象，进行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然后再挑选一些日资企业的日方有关人员或中方有关人员进行访谈，通过对录音和笔记的整理进行多方位的分析。文献分析始终是被看作一种辅助手段，主要用于日方的公司宣传材料研究。

但调查的实施远远比我们预想的要困难。一方面研究者手中缺少现在在宁日资企业的最新资料，另一方面被调查的日资企业对问卷调查的反馈率太低。我们的问卷主要是通过一家被称为“在宁日资企业俱乐部”的团体发放的，这家俱乐部是一个非官方团体，成员覆盖

了南京市有影响的日资企业中的大部分。由于俱乐部不愿意提供成员的名单，问卷只能通过俱乐部事务局之手由网上发放。

由于日资企业的日方经理或主管大多工作繁忙而无暇填写问卷，再加上问卷中某些方面问题的敏感性，问卷回收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们共回收了九家日资企业的日本负责人填答的问卷（另外又专门对一家日资企业的八位中国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由于问卷的样本量太小，也就失去了统计意义，我们不能从问卷的调查结果来推量整体，而只能从个案意义上来处理这些问卷中所反映出来的信息。

于是我们把调查的途径从问卷切换到了访谈。我们访问了十三家在宁的日资企业，做了大量的笔录。其中八家接受访谈的是中方经理或高层管理人员，另外五家是日方经理或高层管理人员。

如果以公司为单位把回收到的问卷数和我们的访谈数加起来，我们共计调查了二十三家日资企业。而从人数的角度上说，由于有的企业是复数的经理或管理人员接受了我们的问卷调查或访谈，所以实际上我们调查的个人样本数是三十二人。由于本次调查的覆盖面还有欠缺，本文的结论将完全建立在案例的分析上，而不着意强调由样本推论整体的所谓的方法论意义上的代表性。

二、历史的影响与发展的限制

“南京大屠杀”对日资企业来宁投资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否成为一个比较大的阻碍因素呢？调查发现，对于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日资企业的中方人员见解比较一致，认为负面的影响肯定存在，而且还比较大。

几位中方经理都谈到了南京市某些市民对日本的抵触情绪，其中甚至还包括了日资企业中的中方高级员工和他们自己。

研：在南京这几年，有没有发现南京有排外倾向？

日：排外倒没有。恨日本人倒是有的。（020422，制造业南京办事处）

日本人至今都没有对历史做过深刻的反省。一次××××（该企业的日方负责人）就对市经委主任讲：“南京大屠杀其实没有杀那么多人。而且如果不抵抗也不会杀了。”日本的政权体制延伸下来还是以前军国主义的那一套。不管是谁上台不是都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吗，实

在太崇拜了！日本政府除了投资，另外一件事就是向外扩张！

去年8月几号的时候不是纪念日吗？我们接到过一个中国人的电话：“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为什么还给日本人干活？罢工!!!”

在南京就是对日本的东西不感冒。比如买××（某种设备）投标，××（某著名日本品牌）不管是质量还是在价格上都是有优势，但老总就是不喜欢日本的东西，这其实也伤害了日本人的感情，担心在这里投资能否收回来的问题。（020418，商社A）

在以前的业务交往中，一个中国人就（对日本人）说：“你们要记住这段历史！你们应该去看看！（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注）”有的中国人还是很介意这点的。（020418B，商社）

总的说来在南京投资难！日本人害怕来南京啊，历史的影响还是主要的。（020423，运输业）

在南京，要想彻底地回避历史是不可能，也是不被允许的。在“日本至今没有对历史做深刻的反省”的情况下，南京市民对日本的抵触情绪有其必然性，南京大屠杀也就始终会作为一个问题摆上桌面，成为日资企业来宁投资主要议程中的一部分。但是“南京大屠杀”对日资企业来说，是否因此就成为一个比较大的投资阻碍因素了呢？实际上情况却未必。日方人员对此的反应是比较复杂的，有的认为历史因素对投资影响较大，有的认为影响一般，还有的则肯定说基本没有影响。

一家日资企业的日方经理表明了日本企业家在投资时的担心：

研：是不是因为在南京，所以投资商就有过犹豫？

日：一般来讲会。

研：是日本企业一般会吗？

日：是日本企业一般会。南京，这儿的报纸上会有宣传，日本的报纸上也会有报道。

研：去大连、上海就不会有任何担心吗？

日：没有任何担心。（020614，制造业）

虽然历史的影响不可否认，但更多的日方经理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影响很大的投资阻碍因

素：

研：在南京的日资企业不多，您认为历史问题是否是主要的原因？

日：历史问题有一点，但是影响不多。现在在南京的日本人已经很多了，相信以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他们来之前一定会问这些在南京呆过的日本人，他们会介绍这里的情况。

(020424, 金融业)

研：因为历史的原因，日本企业会不会不愿意来投资？

日：来南京对日本人来说，还是需要顾虑的事情。但是历史事件是历史事件，但不会因为历史的事件不来。(020515, 商社)

日：我跟市政府、省政府的人说过几次，有人说日本人不来投资是因为南京大屠杀，我说这种事是绝对不可能的。

研：一点都没有影响吗？

日：一点都没有。到了每年八月份的时候，有很多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我很早就呆在南京了，所以我对南京的情况很了解。我在南京呆了七年。合计起来。所以还是…（很长的停顿）日本人..（停顿）对南京不了解。我的朋友或是我的客户第一次来南京，有的人会问我说，南京日本人被杀掉了几个，走在路上感到害怕。我说你们胡说八道什么。我说我在南京呆了七年，包括在南京大学的学生时代，这种事情一次也没听说过。我说你们走在路上害怕吗？然后有人还问我，是不是南京大屠杀，南京人比较厌恶日本人？我说没有这种事情。当然由于这个事情，不喜欢日本人的是有的，我想还很多，但如果老是固执于这种事情，谈这种事情，日常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020429, 商社)

从以上几位日方经理的发言中可以看出，说历史原因一点也没有负面影响显然有悖于现实，即使是最后的那一位肯定地说“一点都没有”的商社经理，也承认“当然由于这个事情，不喜欢日本人的是有的，我想还很多，但如果老是固执于这种事情，谈这种事情，日常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但如果认为正由于有了那么一段惨痛的历史，所以南京就不可能做好对日的招商引资，则很可能是因了一个不全面的认识而放弃了本不应放弃的努力。问题在此显然是，我们应该去探索在历史的沉重下，我们可能做什么，不可能做什么，怎样去做才能做得更好。

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正如一些日方经理所言，南京的弱势主要在于投资环境：

研：在你看来，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对日本人的投资有没有影响？

日：南京的历史虽有影响，只要市场好，效益好，日本人还会来。他们就是为了做生意，为了赚钱。当然，在同等条件下，没有历史更好。如果我们宣传好，他们还是来。（020428，制造业）

研：您觉得南京大屠杀对日本人的投资有没有影响？

日：从我这么多年的感觉来看，南京大屠杀对日资企业的投资影响不大，最主要的还是投资环境。（020429，制造业）

（日本人）并不会因此（指历史原因）而不来南京这块地方。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只要你土地价格低，劳动力成本低，政府支持，对企业有所帮助就好。（020424，金融业）

那么具体地讲，南京市的投资环境的不足之处主要在哪里呢？根据调查的结果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五个方面：

1) 南京的产业分散，没能形成规模效应

很多日资企业认为南京有不少产业，但大多比较分散，没有规模与特色的优势。苏锡两地凭借电子、轻工产业地的特色优势吸引大量日资，形成了“马太效应”，而南京的却没有这种优势。一家商社说：

但可能还有一个产业集中因素，像苏州无锡那块，产业越集中越大，越大越集中。南京没有形成气氛，几个几个分散的，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苏州主要是电子，无锡主要是轻工业，相关的产业大多围绕它配套集中，但南京就没有什么特色的产业。（020418，商社）

2) 完善法律环境方面尚有提高的余地，市民对待投资方的态度有待改善

在我们的访谈过程中，就法律的制度保障这一点，日资企业经营者会不自觉地拿南京的投资环境和日本的投资环境进行比较。在日本，除财政法、税法、劳动法、自然保护法、外汇外贸管理法等一般经济法规对投资都有基本的规定之外，在投资方面还逐步形成了健全的法律体系。这一系列投资立法的制定，为各类投资主体明确了投资方向和实施办法，规定了

政府的鼓励措施和限制办法，并且由于法律完整配套，相互协调，也便与投资者依法办事，从而为投资建立了健全的环境。

而在南京，有的日资企业则感觉不到有这样的法律在有效地保护他们的投资利益。比如投资企业与投资所在地村民的矛盾，就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很多场合问题的解决需要靠行政手段。

他们（指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和村民——注）竟然会向投资的企业提出要求，比如说道路的修整等等，道路是很大的一个方面，我们这家企业是被九个村包围着的，从矿山那儿算起，道路的修整讲的是一种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因为有很多的路通过我们的附近，所以要我们出钱。要求我们贡献几百吨水泥，更可恶的时候是上千吨水泥，钱比如说十万元，要给田里灌水的时候几十万元……比如，不下雨了，他们就会要求我们供应水。也就是说，要求会很多，比如当学校搬家的时候，他们也要求我们出钱。……如果市政府不来压力的话，下面就不会动，这是一个问题。

以前经常和市长、副市长、主任级别的人见面。那些领导非常的（停顿）对于投资的观念想法是很明确的。这一点非常的好。但是整体来讲，比如说，市一级、区一级、镇一级、村一级，越往下面走，越有一种他们开恩让你在投资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强烈。有人还曾经对我说过，投了资，就可以回去了。下面人的想法和上面人的想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还是这家企业谈到：

和大连比起来就完全不同了，这儿太差了。意识有很大的差距。可能说的话有些过分，对不起了。大连那边情况完全不同，那边一般的老百姓，不是市政府的人，他们对外资企业的看法和这儿是完全不同的。象大连那样在历史上有它本身的特点，他们以前从政府到一般的老百姓对外资企业来投资应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成为一个习惯了，还有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一个商业城市。比较起来，南京虽然市政府态度很明朗，但要改变下面人的意识还是很费时间。（020614，制造业）

3) 政府办事机构效率不高，服务意识不够

具体的办事人员的素质构成投资的一种软环境。在我们访谈的十几家日资企业中，有不少公司的管理人员提到目前南京的某些行政机构办事效率仍然不高。我们可以看一下以下两个访谈记录：

我们在南京已经6年了，**领发票**就遇到了大问题。税务局规定一个月只能领一本，如果要领第二本就要申请，怎么领也是领不下来，让人很恼火，办事效率实在是太差了。你看，税务局的电话现在又没人接。在南京做事真是难哪！政府对我们企业一点服务意识都没有。

很多东西在苏州、无锡都买得到，在南京就不行。……像苏州、无锡开展的就是一站式服务，从立项到拿到执照都只要在一个地方办理，在南京就没有，得到处一家家跑。（020422，制造业）

现在南京政府机构办事效率提高多了，但是在政策法规的执行上还是有区别的。如同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在苏州就会为你积极的解决，不违法、不违规……相比南京整个工作态度、水平就不同，它不是积极、主动地去解决问题，整个氛围如此，怎么也推不动了。（020424，金融业务所）

有的被访者则尖锐地提出地方政府对已来宁的日资企业关心不够，指出对在宁的投资企业不要光想着引进来就算大功告成，还要有售后服务意识。一家商社说：

南京市政府像是在钓鱼，我们这些被钓上的企业，他就不管了；而再去钓别的，那么，别的鱼看到我们的处境又怎么会上钩呢？（020429，商社）

招商引资的宣传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种销售行为，销售的是地方的形象，而来投资的企业就是客户。正如现代商界无优良的售后服务就无竞争力一样，招商引资的售后服务意识也是决定事情成败的一个关键。

4) 劳动力素质满足不了高层次人材的需求

日资企业对南京市的普通劳动力有较高的评价：

(南京人)比较和善,性格比较好,作为劳动力素质,这点上来说,还是好的。(020515, 商社)

南京人非常的勤奋,从性格上讲,比较温和。在工厂里作为一般的工人从事工作是非常优秀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就这一点,我们在南京建工厂是没有错的。和上海人比起来,(突然提高音量)当然我对上海并不是很熟悉,但南京人和上海人比起来,工作更认真。对这一点我是很感谢的。(020513, 制造业)

人材很丰富。我到过很多地方,我觉得南京的大学生很认真,从这一点上来说,南京的人材是很丰富的。所以将来我觉得这儿一定会发展。(020614, 制造业)

但是,在南京,中高级人材在可培养性方面却并不令人满意。在日本投资者或管理者看来,企业内,到了管理层一级可培养的人材就比较少了:

南京在管理水平上也差很多,与苏州人的层次就不同,反映在综合素质差。而南京更多见的是“农民企业家”,谈吐啊,各方面的素质都比较差。……苏州那里的人积极向上、热情,对政策了解,对业务熟悉,而南京相反。(020424, 金融业事务所)

大学是比较多,讲到人材,有人讲,南京的大学学生学理论的,比较不会应用,如在上海,需要MBA,就有很多人,而南京,只有几十人。(020515, 商社)

这里的人(大学生)好像有一种比较官僚的思想。认为自己是高级人材,这样的人在南京比较多。这样的思想,比如说,在比较脏的工厂车间修理机器,一边修理,一边思考应该怎样深化自己的管理。像具有这样的意识的人好像很缺乏。所以像这样的,一边通过自己的实际的工作,一边思考自己的管理,这样的人是可培养的。这种人在上海比较多,但在南京就很少。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人有比较大的培养价值,我们为这事也比较苦恼。(020513, 制造业)

5) 地理位置的不利因素

南京地处沿海地区，和上海相距也仅 300 多公里，在国人眼里，南京有地理位置上不可多得的优越性。但从本次调查获知，由于南京与日本之间没有直航，以上海为中心思考问题的日本人却并不看好南京的地理条件，反而在多种场合指出恰恰是地理位置的原因妨碍了日资企业来宁投资。南京的地理位置在三个方面存在着问题：在空中，没有直航，导致了日本到南京必须经过上海中转；水路，则需经张家港或上海；而陆路，上海到南京三百公里的路程，无论是高速公路还是特快，都必须付出三小时以上的时间。日本企业很在乎从上海到南京的这三个小时的时间，日本本身国土面积较小，日本人已习惯以自己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时间这个问题。三个小时的距离，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需要被当作一个问题来对待的距离。

从整体上来说，生活方面，交通的不便是个问题。现在没有直航，这也是属于投资环境吧？如果说，有飞机直飞到禄口机场的话，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像我过节年休就要回去，但要先坐车到上海浦东机场，就要花一天的时间，所以不方便。……也和日本人经常谈这个问题，没有直航可以说是和宣传不到位并列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如果有机场后，情况就不一样了。（020429，商社）

南京的交通地理不方便。南京离上海 300 公里，这段距离，高速火车 4 个小时，一天只有 5 次，如果当天赶不上火车，从日本到南京，一天要到的话，从上海转车是很累的。交通如果得以解决的话，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020515，商社）

没有直航的飞机的话，日本人客户来往不方便，……昨天我送两个客户到上海就要花 3 个半小时，客户感到很累，这么久时间上海飞日本都已经回去了。而且路上很不方便，安全的问题，累得要命。这方面他们是很在意的，交通不方便。（020425，IT 业）

另外，虽然南京市的购买力正在迅速提升，但与上海及周围地区的购买力相比，还是差一些。如果市场主要是在上海，那么运输费用就成了产品追加的成本。

我们的公司的主要市场在上海。我们向上海销售产品。所以，要把产品运到上海，这中间的三百多公里，对于中国人来说，好象还不怎么样，对我们来说，好象有点长了。所以，换种做法的话，以南京为中心这一圈，包括合肥一带，如果有上海这样的购买力，问题就解决了，但实际上南京没有这样的购买力。……可能我们的产品比一般的要贵一些，所以主要集中在上海，可能他们的收入要高一些。如果在离上海更近的地方，如苏州，昆山建厂，会好一点。(020513，制造业)

南京由于离上海相对较远，在接受上海的辐射力方面并不是很强，空间距离也增加了物流的成本。

和无锡比起来，这里空间距离有三百公里，从南京到上海。对于搞物流的来说，比如利用长江把东西送出去，这个三百公里对物流来说是距离比较长的。南京也有很好的港口。张家港大概有一百五十公里。所以大概从上海到张家港到南京各有一百五十公里。这个差距对于搞物流的来说，好像是比较长的。(020429，商社)

三、问题的思考以及大学的使命与作用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已经翻过了六十多个春秋。如果说，它所造成的某些影响不会被时间所冲淡，那么更为重要的，是要在这时间的长河中对未来这种影响将朝哪个方向发展、以及如何将这种影响化为推动日资企业来宁投资的动力作出多层面的预测和思考。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只要日本政治家对历史不忏悔，就永远也不会得到南京市民的宽恕，南京大屠杀将永远会对来宁投资的日资企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不过从总的趋势来讲，只要日本仍然走和平的道路，历史因素的负面影响不会扩大。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因为有过南京大屠杀日本企业在南京会如何如何，而在于日本国内的右倾势力的抬头与得势的可能性如何，正是后者才会决定性地会影响到南京市民对日资企业的态度和感情。如果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右翼势力彻底地登上政治舞台，那么扩大日资企业的来宁投资就必然是一句空话。在日资企业来宁投资的问题上我们格外感到历史的沉重。说历史的沉重，并不是说历史已经成了发展的一个负担，一个瓶颈，而是说历史赋予了发展以特别的意义，这个意义便

在于，它时刻提醒着人们，比如由日资企业的扩大投资推动的发展，在南京绝非只是一个纯经济的事件，无论你的主观认识如何，它都与政治、文化等紧紧连在一起。

其次从现状来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及南京市民存在的对日抵触情绪给打算来宁落户的日本投资者确实带来了一些顾虑。但庆幸的是，这种顾虑在实际的经济行为中产生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日商首先考虑的是市场、企业和利润。只要南京有合适的合作厂家和有利的投资环境，他们还是会果断地来投资的。对日资企业来讲，投资前所进行的市场调查的结论远比单纯讲历史问题要重要的多。在问到来宁投资的动因和渠道时，有一位日方经理的回答很具有典型意义，值得我们去认真的思考。

日本人来南京投资前，会先找已经来南京投资的企业问他们对南京的印象。已来南京投资的企业对南京的印象会影响到，日本企业是否来南京投资。所以要善待现有在南京的企业。
(020515, 商社)

从文化上来讲，日本人具有集群性的特点，日本企业间的互助与联系，在海外投资中会以“先辈”（先到者）、“后辈”（后来者）的关系反映出来，而“后辈”常常会遵从“先辈”的意见建议。了解已在宁投资的日本企业状况，听取他们在宁投资情况的反馈意见，由他们进行引荐，最终被吸引到南京进行投资，这种通过朋友或者同行推荐的情况在日本中小企业来宁投资中比较普遍。应该切忌急功近利式的招商引资，切忌钓了鱼然后不养鱼，而转身“再去钓别的”，要确实实地“善待现有在南京的企业”。

再次，虽然南京市民中也确实存在着某些抵触情绪，日本投资者为此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总的来说，在日常生活和经营活动中，日资企业遇到的历史因素干扰是非常小的。日方在南京投资的主要障碍，确切地说，一是不了解南京的一些日本企业家在心理上的恐惧担心，二是投资环境中确实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

许多场合，由于不了解而对于南京产生的某种恐惧和担心会在想象中被夸大。有时起渲染作用的是媒体，其中有日本的媒体也有国内的媒体。因此，如何正确客观地报道南京市民对日本人的感情和态度，正确地、大力地介绍南京的投资状况和投资利益，是南京媒体甚至是政府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几位日资企业的被访者谈到：

要吸引更多的投资，一个是外宣办的宣传，另外一些好效益的企业存在也挺重要，政策上也要好一些。(020428, 制造业)

南京的综合知名度比苏州、无锡要差，而且一提到南京，在日本不会想到商务方面的事，一提到商务贸易就会想到苏州、无锡。宣传有问题。(020418, 外贸)

另有一位日资企业的被访者说话更为尖锐：

研：是不是南京市的宣传方式不对？

日：不是，是根本没有做努力，而不是方式不对。比如说，张家港的市长在 12 月份带了一个团到日本去访问。3 月份，又带了一个团到日本开招商恳谈会。一次竟然来了 200 多人。会后，大家都在思考是不是去张家港投资。其中有大的制造厂家，也有中等的制造厂家。一星期以后，苏州又来了。苏州也很快。

研：也是市长带团吗？

日：是否是市长不太清楚。苏州来的那周，无锡也来了。而张家港之前，是宁波和深圳，深圳也来了。每次都聚集了 200 多号人开恳谈会。实际上我 3 月底到南京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去，那开发区的主任我很熟悉，但我没有对那主任说。而是对中日友协的一个姓 X 的说了，南京要招商，一定要做同样的事情。这样日本人才知道南京是个投资的好地方，才知道南京招商引资的决心。那儿有扬子石化，扬子石化的一些关联设备是我们投资的。我们对扬子也非常熟悉。如果大家知道新区就在扬子石化的边上，大家都会知道是个好环境的。后来我听说像这样的说明一点都没有做。

研：是不是有扬子石化和没有扬子石化在名字上很不一样的？

日：当然当然，当然很不一样。所以日本人不知道南京的投资环境是好呢，还是不好。因为没有这样的说明，所以到了南京来也不知道南京有什么样的人，不象张家港市这样的，大家都是市长亲自带了团去开恳谈会。这样日本人就知道了，市长亲自来，而且有这样的地方。张家港实际上在日本很少有人知道的，应该说，日本人了解张家港远不如了解南京。南京苏州远为有名。张家港到底是什么地方？现在从张家港回来的人会告诉其他日本人张家港是个很好的地方，而且那里有很好的港口。我在那边也有投资了四家企业。所以重要的是要宣传。我跟他们说了好几遍要宣传。(020429, 商社)

以上这位被访者对南京市有关部门所做的宣传努力的根本否定，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但

我们可以从其过激的词语中看出他对宣传工作的期待和关注。也正因为他对南京的热爱（他自己说他把自己看作了一个南京人）以及对南京宣传工作有着不同寻常的期待与要求，所以才有其“怒其不争”式的焦虑。

而投资环境中存在的种种不足，比如本文第二部分涉及到的那些问题，有许多不是在朝夕之间可以立刻解决的，需要各方面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坚忍不拔的努力。在当下什么能做，什么还做不到，关键是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以及表现出一种能得到日资企业理解和肯定的努力姿态。

最后，在历史问题上，一般看法总是把南京大屠杀的有关宣传和吸引日资来宁看作是对立的东西，其实问题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可以积极地思考一下历史事件是否能够转化为推动日资企业来宁投资的动力。一种浅层次的想法就是期待日本人来南京赎罪，并以赎罪的心情通过投资弥补中日历史上这段憾事造成的不良影响，于是南京以被害者得到赔偿的形式得到日方的投资。我们在此想谈的当然不是这一层次的动力转换，虽然不可否认这样也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效果。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作为历史上的一座受害深重的城市，我们如何来加深和促进中日双方对对方民族和文化的理解，如何把经济的交流建立在深层次的对方理解、尤其是文化理解的基础上。渲染日本人是一个怎样残酷的民族，具有何种民族劣根性并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先要让市民对日本民族和文化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客观的认识，认识到它作为一个民族和作为一个文化的长处和缺点，然后才能做出如何和它交往的选择。一个在历史上受害深重的城市，为客观地理解对方的民族和文化做出不断的努力，其意义或许会大于未曾遭受过这种历史之痛的城市，一旦这种意义也为对方所意识到，相互的理解就会更容易加深，真正的经济投资才会有可能。比如我们在谴责日本民族不忏悔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它为什么不忏悔，许多问题设问的方式都应该从问“为什么”开始，这是相互理解的第一步。当南京市民习惯了以“为什么”的设问方式思考中日之间的交流关系（包括经济交流）时，历史事件才能真正转化为推动日资企业来宁投资的动力。

21 世纪中日关系中大学的使命与作用，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正在于此。如果说普遍被认同的大学的使命在于研究、教学和社会服务，那么，除了研究者自己的对于“为什么”的不断追问外，除了培养在校大学生对于“为什么”的不断追问之学习习惯与学术态度外，大学还有义务和责任为社会服务，通过普及性的读物、新闻评论、市民讲座、电视辩论等渠道，提高一般市民的理性思维能力。在问“为什么”的理性思维中，人们对于 21 世纪中日之关系，以及将来的走向和人们所应该努力的方向，就会有一个崭新的认识。